

【社会洞察】

“自发”更真实

作家郅国培生前讲过一段真实的事：1945年日本投降后消息传到四川的一个小镇，居民、难民纷纷到鞭炮铺里买鞭炮。等不及付钱，干脆上货架自己拿，后来抢到抢，转眼鞭炮抢光，不见了人影，店铺一片狼藉。老板一下傻了眼，喜庆变成了全家的灾难；他只好打扫铺面，当他俯下身子一看，一下又傻了眼：满地散落的全是钞票，一清点，是鞭炮钱的好多倍。郅将这个真实事情写进了他的长篇《长江三部曲》。

由此我想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七十多年前发生的另一件真实的事情：抗日名将张自忠枣阳决战捐躯沙场，灵柩经宜昌溯江而上运往陪都重庆。宜昌居民家家焚香，倾城而出为他送行。没人发起，无人号召，场面感动天地……

这大概可以同此后的兰考乡亲们为焦裕禄送葬；周总理逝世天安门花圈如山、诗海如潮；“四人帮”倒台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举杯欢庆，无须动员，不必组织，纯粹

的自发。在我看来，这种群体性出自心灵的、不约而同，乃千金难买的民意，价值连城的真情。

官媒曾走过群众“自愿捐款”、“自动争购”、“万人空巷送书记”一类的文字，活灵活现，让人动容。但事后才知道，那中间不少是利用行政力量精心导演的假“自发”、“被自发”。正如作家王跃文所述，《魔鬼词典》里从此又增加一个词条：“自发，乃有关方面采用行政命令手段组织群众开展某种活动。”

有人老教导我们“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，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”，然而普通百姓自发性的直觉，比某些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实。某些新闻发言人可以搬出一大堆数据，振振有词地宣讲着某某项目的成功……老百姓则更相信自己的所经所历，所见所闻。

有人老瞧不起“自发”，以为“自觉”比“自发”高出一等。教科书也一直教导我

□符号

们：“自觉”是“自发”的提升，“自发”是认识的初级阶段，“自觉”才是高级阶段。其实“自觉”得过分，就成为矫情、圆滑与冷血；正如有些贪官落马前成天把“群众，群众”挂在嘴上，乃是老不忘自己身份，并时时强化着这种身份的一种作态。

薄熙来说：“做清官，是一种境界”；周永康说：“对贪污腐败，我们是零容忍”；徐才厚说：“我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廉洁”；刘志军说：“执政为民，廉洁奉公……”这些都是“自觉”的名言。除了证明他们“自觉秀”的狡诈与卑劣，证明其伪君子本色，别无效果。

某些地方官员，不时仿效大领导去挤公交、扫马路，去农户家包饺子、擀面条，并不忘让记者“偶遇”，那其实正是“自觉”的邯郸学步、东施效颦，让人恶心。

宁要本色示人的原生态的低级“自发”，也不要那种装腔作势、装神弄鬼式的高级“自觉”。假“自觉”与假“自发”，都不过是鲁迅笔下的“做戏党”。

【世说新语】

不要“以不情为伦纪”

我注意到，近十年来，关于古代的“二十四孝”频起争议，至今不绝。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因为这些争议本身就告诉我们：“二十四孝”是一笔必须谨慎对待的精神遗产。

中国人自古喜谈道德，说得学术化一点，叫“泛道德主义”，把道德挂在嘴边，这也道德，那也道德。于是中国成了一个“道德义士”和“道德佳话”几近泛滥的国度。要命的是，我们几千年来津津乐道的很多“道德佳话”往往有违“人情之常”。大禹治水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是堂堂地被写入“正史”，但细究起来，就颇为可疑，因为这太有违人情。所以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曾就此揶揄道：“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都是晚上偷偷地跑回来。”

鲁迅当年痛诋“二十四孝”的故事，也是因为这些宣扬“孝亲”的故事太有违正常的人情。“黄香扇枕”、“子路负米”尚称可学，但条件也是小孩子能“扇”得动，“负”得动；“陆绩怀橘”讲的是三国时陆绩在袁术的宴会上偷橘子“归以遗母”。这似乎也不难，当然前提是有闲人请我等吃饭；“哭竹生笋”就可疑：“孟宗后母好笋，令宗冬月求之，宗入竹林恸哭，笋为之出。”如是狠毒之后母姑且不论，鲁迅说“怕我的精诚未必能够感动天地”；至于“卧冰求鲤”，大冷的天，为了后母能喝上鱼汤，脱去衣服睡到冰上，准备用体温融化冰捉鱼，可就有害性命之虞了。到了“郭巨埋儿”，说的是汉郭巨家贫，有子三子，贫乏不能供母，子又分母之食，竟埋此子。这样的“孝亲”故事已经让少年鲁迅“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，完全绝望”，且“我已经不但不敢再想做孝子，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”。

历朝历代所以宣称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，无非是由“孝亲”可以推演出“忠君”、“体国”。中国的很多道德原则看似对等，其实是有差等的，所谓“君惠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”，侧重者在“臣忠”、“子孝”、

【生活直击】

作家的“隐”与“显”

作家莫言近日在出席一次活动时说，自打获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就没有好好坐下来搞创作，心情浮躁，身不由己。打算尽快告别这些出头显面的事，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找一个地方“躲起来”写一部作品，“不管是大的(作品)还是小的(作品)。”

如果是莫言的心声，那我们该为他庆幸。说实话，获奖后的这两年多来，莫言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。曾有媒体对莫言这两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，大致是七件事，不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而是“演讲、出席活动、担任顾问、评足球、参观、题字、对话”。这的确很讽刺，但也是对莫言的一个善意提醒。

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把自己“隐”起来，安静而安心地写作，应该是他的生活常态。莫言的得奖，就得益于他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默默地把自己“隐”在书斋，老老实实地爬格子。他如果还想有所前进，继续推出有影响的新作，那就得把自己继续深深地“隐”起来，排除干扰，心无旁骛，否则，要像现在这样，天天“显”在外边，风光倒是挺风光，但要想写出点像

样的东西，恐怕难了。

作家要不要“显”？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你不是隐士，写书就是为了要给公众看的，时不时地“显”一下也在所难免，像签名售书、开会领奖、接受访谈、出席活动、推介自己等，都是作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但无论如何，不能本末倒置，把出头露面当主要工作，把写书创作当成次要任务。因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，倘若一个正值旺年的作家很久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，他一定是“隐”在哪个地方潜心创作，不久的将来，就会有新作问世，给大家带来惊喜。反之，如果哪个作家老是“显”在外边，三天两头见报，四街八巷演讲、广播有声，电视有影，那他八成是黔驴技穷，江郎才尽，再也写不出什么精品佳作，就靠吃老本混日子了。

记得前几年作家余华从美国讲学回来，感到非常“惭愧”，因为，他到美国后才发现，“欧美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，都甘于寂寞，常年隐在家里，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，而我们却都在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五本书，主要的精力却



漫画/金红

“弟恭”，且“弟恭”、“子孝”、“臣忠”构成一个层层推演、累积的伦理系统。因为弟弟要尊敬、爱戴兄长，儿子要服从、孝顺父亲，所以，臣子自然应该对君主尽忠。可见，“二十四孝”故事背后的推手正是古代的皇权专制主义，其目的并不是要培养“孝子”，而是“忠臣”。曹操以“非孝”的罪名杀了孔融，所谓“非孝”，只不过是“欲加之罪”的借口罢了，说到底，曹操又哪里算是什么忠臣孝子！

道德滑坡或谓“道德血液”的败坏，是任谁都无法为我们这个时代开脱的，但道德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全靠“讲道德”。这里还是让我们来重温当年胡适的教诲吧：“一个干净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，谈高尚，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，人人大公无私，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。”胡适的很多话即使今天听来依然是振聋发聩，此亦是一例。

作为“传统经典阅读”活动的“节目”之

一，女儿的学校让家长给每个学生准备古代的蒙学读本《幼学琼林》，我随手翻看之余不免大惊失色。这里随便举个例子，比如，“夫妇”一门，有“杀妻求将，吴起何其忍心”；蒸梨出妻，曾子善孝道”。前句谓吴起为了能当上讨伐齐国的鲁军主将，竟杀死自己的齐国籍妻子以消除鲁人的怀疑；后句谓孔子的学生曾参因为妻子蒸梨不熟，其母不肯吃，就休掉了妻子。吴起是武人，刻毒一点也就罢了，且对吴起的“杀妻求将”，《琼林》的态度尚称暧昧；曾子的“蒸梨出妻”，《琼林》是明确赞其“善孝道”的。而曾子可是“行为世范”的大贤，如此刻戾寡恩，如若不是后人杜撰，我就难免欲骂一声——这样的人简直就不配有妻！此类故事和“二十四孝”里的“老莱娱亲”等正是一类，“将肉麻当有趣，以不情为伦纪，污蔑了古人，教坏了后人”，鲁迅说得何其痛快！

谁都不能说“弘扬传统”有错，但“弘扬传统”往往被弄到乌烟瘴气的田地，却是谁之过？

□陈鲁民

用在抛头显面上。”所以，他也准备少写精写，潜心创作，把自己“隐”起来。台湾作家刘墉则说：“要写作吗？先关上你的门。”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。一个作家，要想有点成就，至少在你创作期间，一定要把自己“隐”起来，远离喧嚣的尘世，拒绝各种世俗的诱惑。如果太在乎外界的评价，太热衷于各种活动，心绪不安，神昏八极，就不可能创造出好作品，更不可能超越时代。

当然，作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食五谷杂粮，所以既需要“隐”也需要“显”，既需要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，也需要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关键是要把握好“隐”与“显”的尺度与分寸。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比例，我以为大体上“一分显，九分隐”为宜，毕竟作家不是演员，立身处世靠的是文学作品。

“很忙”的莫言马上要把自己“隐起来”了，每个想有所作为的作家也应把自己“隐起来”。今天“隐”得越深越隐蔽，将来就会“显”得越漂亮越精彩。这又不只是对作家说的。

《晚晴楼联话》有云：“金陵‘光复’之初……某日，曾公(国藩)邀钟山书院院长李小湖微服同泛秦淮，青楼中有妓名春燕者，温柔儒雅，吐属尤佳，曾公奇之，后为人量珠聘去，不复得见，曾公书联赠之。”其联为：“未免有情，对酒绿灯红，一别竟伤春去了；似曾相识，怅梁空泥落，何时重见燕归来。”

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的梁羽生，在论及“散文入对，通俗如话，而又工稳大气”的对联时认为，打破了曾国藩“伪道学”的一面，而流露出他“真性情”的另一面，比读他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有趣得多。以国人盛誉的家教经典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来反衬是联，委实令人耳目一新。

据说由中国大陆与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于2000年首先在中国内地播出后，徐志摩的堂侄、同济大学退休教

【谈古论今】

“伪道学”与“真性情”

□金新

授徐炎说：“《人间四月天》违背历史事实，歪曲了徐志摩的形象……徐志摩是‘五四新文化运动’的一将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……剧中的徐志摩不像一个诗人，而成了一个只会成天追逐女孩的‘花花公子’。”

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系“五四运动”与“新文化运动”两词的合称，《五四运动史》将1917到1921这五年笼统称作“五四时代”，并划为两阶段：“在第一个阶段，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全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。在第二个阶段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，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。于是活动范围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。”徐志摩是“干将”就不能有“男欢女爱”而只能有“伪道学”，此似乎与这场运动的主旨略有背道而驰。

每读情诗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，总被一种“真性情”所感动着，林徽因不愧为徐志摩“茫茫人海中”的“唯一灵魂之伴侣”。1931年11月19日，徐志摩因赶赴北京聆听林徽因演讲而飞机失事罹难于济南，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特为其写挽联曰：“谈话是诗，举动是诗，毕生行径都是诗，诗的意味渗透了，随遇自有乐土；乘船可死，驱车可死，斗室生卧也可死，死于飞机偶然者，不必视为畏途。”要是换成以后的北大校长，作为教授的徐志摩大约或肯定祭了远离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之北大的“伪道学”旗帜。

人性是极为丰富的内在世界，性格是极为复杂的心理系统，“高大全”的“正能量”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正能量。我们不必欣赏曾国藩“赠妓女春燕联”，但也不要因此而腹诽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盖因“高大全”比“伪道学”更可怕。

昔日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，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，有趣的是，两年后本科毕业，她却选择到“人权状况恶劣”的美国去留学，嗣后竟然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。幸亏当时的北大没有由于马楠的“痛斥”而高调表彰抑或破格提拔，不然现在的马楠可能是另一个模样，“荫庇”的结果，也许会产生一个将“真性情”深藏于“伪道学”之下的具有可怕心机的可怕女人。

一个不受“荫庇”的人，在“酱缸”沉浮而自生自灭之余，“人民性”备矣，反而极有几率一如佛语：“长成大树，荫庇众生。”

完美无缺的形象乃“扁平形象”，这“既脱离生活真实，也背离人性真实”，是公民意识下的大忌！

投稿邮箱：

qlwbzawen@163.com